

刘学智 著

# 关学思想史

学术研究系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关学文库

总主编 刘学智 方光华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关学文库 总主编 刘学智 方光华

学术研究系列

# 关学思想史

刘学智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学思想史/刘学智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4. 12

(关学文库/刘学智, 方光华主编)

ISBN 978-7-5604-3546-6

I. ①关… II. ①刘… III. ①关学—思想史—研究  
IV. ①B244.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2450 号

出品人 徐 晔 马 来

篆 刻 路毓贤

出版统筹 张 萍 何惠昂

## 关学思想史 刘学智 著

---

责任编辑 马 来 朱 亮 装帧设计 泽 海

版式统筹 曹金刚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 710069

网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E - mail [xdpress@nwu.edu.cn](mailto:xdpress@nwu.edu.cn)

电 话 029-88303593 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35.5

字 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3546-6

定 价 73.00 元

---

## 《关学文库》组织工作委员会

- 主 任 赵正永
- 副 主 任 江泽林 王莉霞 张岂之 陈国强 张祖培
- 执行副主任 徐 晔
-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 上官吉庆 | 马 来 | 王 勇 | 王莉霞 |     |
| 王景安  | 方光华 | 权 俭 | 刘学智 | 江泽林 |
| 李 浩  | 李明远 | 张小宁 | 张岂之 | 张社年 |
| 张祖培  | 陆柯仑 | 陈国强 | 岳 亮 | 赵正永 |
| 赵馥洁  | 姜 锋 | 桂维民 | 徐 晔 | 郭大为 |
| 郭立宏  | 阎晓宏 | 彭树智 | 董 军 | 薛保勤 |

## 《关学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岂之

副 主 任 赵馥洁 薛保勤

执行副主任 徐 晔 马 来

总 主 编 刘学智 方光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来 王美凤 方光华 米文科 许 宁

孙学功 刘学智 杨建辉 李似珍 李颖科

何惠昂 张 波 张 萍 张 雄 张世民

张岂之 陈战峰 林乐昌 赵瑞民 赵馥洁

郝润华 袁志伟 徐 晔 高彦平 郭文镐

曹树明 韩 星 路毓贤 薛保勤 魏 冬

## 总序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宋凤翔府郿县(今陕西眉县)人,祖籍大梁,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张载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张复在宋真宗时官至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死后赠司空。父亲张迪在宋仁宗时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张迪死后,张载与全家遂侨居于凤翔府郿县横渠镇之南。因他曾在此聚徒讲学,世称“横渠先生”。他的学术思想在学术史上被称为“横渠之学”,他所代表的学派被后人称为“关学”。张载与程颢、程颐同为北宋理学的创始人。可以说,关学是由张载创立并于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在关中地区传衍的地域性理学学派,亦称关中理学。

关学基本文献整理与相关研究不仅是中国思想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也是体现中国思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举措。《关学文库》以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华文化为宗旨,以文献整理的系统性、学术研究的开拓性为特点,是我国第一部对上起于北宋、下迄于清末民初,绵延八百余年的关中理学的基本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大型丛书。这项重点文化工程的完成,对于完整呈现关学的历史面貌、发展脉络和鲜明特色,彰显关学精神,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关学文库》即将出版发行之际,我仅就关学、关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关学的思想特质、《关学文库》的整体构成等谈几点意见,以供读者参考。

### 一、作为理学重要构成部分的关学

众所周知,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形态与新阶段,一般被称为新儒学。但在新儒学中,构成较为复杂。比较典型的则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南宋学者吕本中较早提到“关学”这一概念。南宋朱熹、吕祖谦编选的《近思录》较早地梳理了北宋理学发展的统绪,关学是作为理学的重要一支来

作介绍的。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将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并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将宋代理学概括为“濂洛关闽”四大派别,其中虽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但它们的思想内涵及其影响并不限于某个地域,而成为中华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即宋代理学。

根据洛学代表人物程颢、程颐以及闽学代表人物朱熹对记载关学思想的理解、评价和吸收,张载创始的关学本质上当是理学,而且是影响全国的思想文化学派。过去,我们在编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宋明理学史》上册的时候,在关学学术旨归和历史作用上曾作过探讨,但是也不能不顾及古代学术史考镜源流的基本看法。

需要注意的是,张载后学,如蓝田吕氏等,在张载去世后多归二程门下,如果拘泥门户之见,似乎张载关学发展有所中断,但学术思想的传承往往较学者的理解和判断复杂得多。关学,如同其他学术形态一样,也是一个源远流长、不断推陈出新的形态。关学没有中断过,它不断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融合。明清时期,关学的学术基本是朱子学、阳明学的传入及与张载关学的融会过程。因此,由宋至清的关学,实际是中国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动态的且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概念,它开启了清初王船山学术的先河。

《关学文库》所遴选的作品与人物,结合学术史已有研究成果,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关学编》及《关学续编》《关学宗传》等,均是关中理学的典型代表,上起北宋张载,下至晚清的刘光蕡、民国时期的牛兆濂,能够反映关中理学的发展源流及其学术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与历史上的《关中丛书》相比,这套文库更加丰富醇纯,是对前贤整理文献思想与实践的进一步继承与发展,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 二、张载关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

佛教传入中土后,有所谓“三教合一”说,主张儒、道、释融合渗透,或称三教“会通”。唐朝初期可以看到三教并举的文化现象。当历史演进到北宋时期,由于书院建立,学术思想有了更多自由交流的场所,从而促进了学人的独立思考,使他们对儒家经学笺注主义提出了怀疑,呼唤新思想的出现,于是理学应时而生。理学主体是儒学,兼采佛、道思想,研究如何将它们融合为一个整体,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从理学产生时起,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学学派。

比如,在“三教融合”过程中,如何理解“气”与“理”(理的问题是回避不开的,华严宗的“事理说”早在唐代就有很大影响)的关系?理学如何捍卫儒学早期关于人性善恶的基本观点,又不致只在“善”与“恶”的对立中打圈子?如何理解宇宙?宇宙与社会及个人有何关系?君子、士大夫怎么做才能维护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又能坚持修齐治平的准则?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中宇宙观与人生观的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不可能一开始就有一个统一的想法,需要在思想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加以解决。宋代理学的产生及不同学派的存在,就是上述思想文化发展历史的写照,因而理学在实质上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南宋时朱熹闽学各有自己的特色。作为理学的创建者之一,张载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抱负,在对儒学学说进行传承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北宋时期,学者们重视对《易》的研究。《易》富于哲理性,他通过对《易》的解说,阐述对宇宙和人生的见解,积极发挥《四书》义理,并融合佛、道,将儒家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载与洛学的代表人物程颢、程颐等人曾有过密切的学术交往,彼此或多或少在学术思想上相互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张载来到京师汴京,讲授《易》学,曾与程颢一起终日切磋学术,探讨学问(参见《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张载是二程之父程珦的表弟,为二程表叔,二程对张载的人品和学术非常敬重。通过与二程的切磋与交流,张载对自成一家之言之学术思想充满自信:“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因为张载与程颢、程颐之间为亲属关系,在学术上有密切的交往,关学后传不拘门户,如吕氏三兄弟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薛昌朝以及种师道、游师雄、潘拯、李复、田腴、邵彦明、张舜民等,在张载去世后一些人投到二程门下,继续研究学术,也因此关学的学术地位在学术史上常常有意无意地受到贬低甚至质疑(包括程门弟子的贬低和质疑)。事实上,在理学发展史上,张载以其关学卓然成家,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理论建树,这是不能否定的。反过来,张载的一些观点和思想也影响了二程的思想体系,对后来的程朱学说及闽学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张载依据《易》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在基本点上和《易》的原有内

容并不完全相同。他提出“太虚即气”的观点,认为没有超越“气”之上的“太极”或“理”世界,换言之,“气”不是被人创造出的产物。又由此推论出天下万物由“气”聚而成;物毁气散,复归于虚空(或“太虚”)。在气聚、气散即物成物毁的运行过程中,才显示出事物的条理性。张载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正蒙》卷一)他用这个观点去看万物的成毁。这些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

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是万物和人的父母,人是天地间藐小的一物。天、地、人三者共处于宇宙之中。由于三者都是气聚之物,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所以人类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归根到底,万物与人类的本性是一致的。进而认为,人们“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里所表述的是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境界。

二程思想与张载有别,他们通过对张载气本论的取舍和改造,又吸收佛教的有关思想,建构了“万理归于一理”的理论体系。在人性论方面,二程在张载人性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孟子的性善论。二程赞同张载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但二程认为“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无瑕的;“气质之性”是气化而生的,也叫“才”,它由气禀决定,禀清气则为善,禀浊气则为恶,正因为气质之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气”的侵蚀而出现“气之偏”,因而具有恶的因素。在二程看来,善与恶的对立,实际上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

朱熹将张载气本论进行改造,把有关“气”的学说纳入他的天理论体系中。朱熹接受“气”生万物的思想,但与张载的气本论不同,朱熹不再将“理”看成是“气”的属性,而是“气”的本原。天理与万事万物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朱熹关于“理一分殊”的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又说:“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朱子语类》卷九四)“理一分殊”理论包括一理摄万理与万理归一理两个方面,这与张载思想有别。

总之,宋明理学反映出儒、道、释三者融合所达到的理论高度。这一思想的融合完成于两宋时期。张载开创的关学为此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正如清初思想家王船山所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子正蒙注·序论》)船山之学继承发扬了张载学说,又有新的创造。

### 三、关学的特色

关学既有深邃的理论,又重视实用。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风笃实,注重践履。黄宗羲指出:“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明儒学案·师说》)躬行礼教,学风朴质是关学的显著特征。受张载的影响,其弟子蓝田“三吕”也“务为实践之学,取古礼,绎其义,陈其数,而力行之”(《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特别是吕大临。明代吕柟其行亦“一准之以礼”(《关学编》)。即使清代的关学学者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人,依然守礼不辍。

其次,崇尚气节,敦善厚行。关学学者大都注意砥砺操行,敦厚士风,具有不阿权贵、不苟于世的特点。张载曾两次被荐入京,但当发现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时,毅然辞官,回归乡里,教授弟子。明代杨爵、吕柟、冯从吾等均敢于仗义执言,即使触犯龙颜,被判入狱,依旧不改初衷,体现了大义凛然的独立人格和卓异的精神风貌。清代关学大儒李颀,在皇权面前铮铮铁骨,操志高洁。这些关学学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体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

最后,求真求实,开放会通。关学学者大多不主一家,具有比较宽广的学术胸怀。张载善于吸收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儒学理论。他注意对物理、气象、生物等自然现象做客观的观察和合理的解释,具有科学精神。后世关学学者韩邦奇、王徵等都重视自然科学。三原学派的代表人物王恕以治易入仕,晚年精研儒家经典,强调用心求学,求其“放心”,用心考证,求疏通之解,形成了有独立主见的治国理政观念。关学学者坚持传统,但并不拘泥传统,能够因时而化,不断地融合会通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由张载到“三吕”、吕柟、冯从吾、李颀等,这种融会贯通的学术精神得到不断承传和弘扬。

#### 四、《关学文库》的整体构成

关学文献遗存丰厚,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整理,除少量著作如《正蒙》《泾野先生五经说》《少墟集》《元儒考略》等在清代收入《四库全书》之外,大量的著作仍散存于陕西、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或民间,其中有的在大陆已成孤本(如韩邦奇的《禹贡详略》、李因笃的《受祺堂文集》家藏抄本),有的已残缺不全(如《南大吉集》收入的《瑞泉集》残本,现重庆图书馆存有原书,国家图书馆仅存胶片;收入的南大吉诗文,搜自西北大学图书馆藏《周雅续》)。即使晚近的刘光蕡、牛兆濂等人的著述,其流传亦稀世罕见。民国时期曾有宋联奎主持编纂《关中丛书》(邵力子题书名),但该丛书所收书籍涉及关中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内容驳杂,基本上不能算是关学学术视野的文献整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华书局将《张载集》《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关学编(附续编)》《泾野子内篇》《二曲集》等收入《理学丛书》陆续出版,这些仅是关学文献的很少一部分。全方位系统梳理关学学术文献仍系空白。

关学典籍的收集与整理,是关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整理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关学研究的深入和关学精神的弘扬,影响到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掘。

现在将要出版的《关学文库》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共40种,47册,约2300余万字。

一是文献整理类,即对关学史上重要文献进行搜集、抢救和整理(标点、校勘),其中涉及关学重要学人29人,编订文献26部。这些文献分别是:《张子全书》《蓝田吕氏集》《李复集》《元代关学三家集》《王恕集》《薛敬之张舜典集》《马理集》《吕柟集·泾野经学文集》《吕柟集·泾野子内篇》《吕柟集·泾野先生文集》《韩邦奇集》《南大吉集》《杨爵集》《冯从吾集》《王徵集》《王建常集》《王弘撰集》《李颙集》《李柏集》《李因笃集》《王心敬集》《李元春集》《贺瑞麟集》《刘光蕡集》《牛兆濂集》以及《关学史文献辑校》。

二是学术研究类,其中一些以“评传”或年谱的形式,对关学重要学人进行个案研究,主要涉及眉县张载、蓝田吕大临、高陵吕柟、长安冯从吾、朝邑韩邦奇、周至李颙、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户县王心敬、咸阳刘光蕡等学人,共11部。它们分别是:《张载思想研究》《张载年谱》《吕大临评传》《吕柟评传》

《韩邦奇评传》《冯从吾评传》《李颀评传》《李柏评传》《李因笃评传》《王心敬评传》《刘光蕡评传》等。此外,针对关学的主要理论问题与思想学术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共3部。这些著作分别是:《关学精神论》《关学思想史》《关学学术编年》等。

在这两部分内容中,文献整理是文库的重点内容和主体部分。

《关学文库》系“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大力支持。文库的组织、编辑、审定和出版工作在组织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委员会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和西北大学出版社负责。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对这一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国家和省级重大文化精品图书高度重视,亲自担任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自始至终关心支持文库的编撰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江泽林,副省长王莉霞和省政府秘书长陈国强等对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给予悉心指导;原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薛保勤,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赵馥洁,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主任张祖培对文库的策划与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库历时五年编撰完成,凝结着全体参与者的智慧和心血。总主编刘学智、方光华教授,项目总负责徐晔、马来同志统筹全书,精心组织,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郑州大学等十余所院校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协力攻关,精益求精,体现出深沉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责任感;他们孜孜矻矻,持之以恒,任劳任怨,乐于奉献,以古人为己之学相互勉励,在整理研究古代文献的同时,不断锤炼学识,砥砺德行,努力追求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学术品格。出版社组织专业编辑、外审专家通力合作,希望尽最大可能提高该文库的学术品质。作为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我谨向大家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紧迫、经验不足等原因,文库书稿中的疏漏差错难以完全避免。希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使用时加以批评指正,以便日后进一步修订,努力使该文库更加完善。

张岂之

2015年1月8日

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 自序

关学开宗，肇自横渠。北宋时期，在陕西关中形成了一个以张载为核心、以其创立的新儒学为特征的有全国性影响的地域性学术流派，史称关学。张载所创立的关学为孔孟儒学在宋代的重建和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张载也因此而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张载及其关学，无论是在宋明理学史上还是在宋代后的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张载不仅是关学学派的创立者，而且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奠基者。这主要表现在：宋明理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和重要命题，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大多已提出或已见端倪；理学的基本框架在张载那里已见雏形；张载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把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相贯通，力破汉唐儒学“天人二本”之弊，确立了“性与天道合一”的理学主题，这一路向成为后来理学发展的基本理路和理论旨趣；张载批判佛老，这也成为后来理学家的基本理论立场，而且在批判佛老的过程中，张载提出了“太虚即气”命题，开出理学颇具特征的虚气一体的思想，此不仅是张载宇宙论的核心和基石，也成为理学家讨论宇宙论不可回避的问题。张载以虚气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与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鼎足相峙；张载提出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变化气质”的工夫论以及“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心统性情”的认识论和“立诚”“尽性”的道德修养论，也多为后儒所继承和阐发。朱熹指出，张载的诸多说法“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特别是《西铭》所阐发的“民胞物与”的思想，对后世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程颐说：“《西铭》明理一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宋史·张载传》）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为”说，涉及社会和民众的精神境界、生活意义、学统传承、政治理想等，表现出张载博大的胸襟与高尚的情怀，彰显出这位大儒的器度与宏愿，展示了他对人类最高理想的向往，所以一直为历代士人所传诵，成为鼓舞人们树立远大理想、选择人生方向，确立生命意义的座右铭。

关学传衍发展的过程相当复杂:既有师承的直接接续,又有思想上的间接承传;既有学脉上的一贯性,又有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相对的特殊性;既有张载学说的正传发展,也有关学在与异地学派的学术交往中发生的互动与交融,从而使自身学术思想发生着顺应时代的某些变化。关学正是在这种“常”与“变”“一”与“多”的矛盾冲突中,即在其学术宗旨和思想特征的明晰、恒定与顺应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理论特殊性的矛盾冲突中,演绎出一部既有时代普遍性又有地域特殊性,既有低谷又有高潮的波澜起伏的关学思想史。

张载可看见的弟子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游师雄、苏昞、范育、种师道、潘拯、李复、张舜民等。其中蓝田“三吕”,武功苏昞、游师雄,三水范育,长安李复等人,对关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张骥所说:张载身后“一时蓝田、华阴、武功诸儒阐扬师旨,道学风行,学者称初祖焉”(张骥:《关学宗传·自叙》)。在张载逝世后,关学诸弟子继承张载“为往圣继绝学”之志,有不少人先后投奔二程门下,黄宗羲遂有“关学再传何其寥寥”的感叹。虽然从师承传授方面说,关学似乎不像洛学,但是,明万历年间由冯从吾广泛搜求,汇集宋、金、元、明时期关学学者行实所著成的《关学编》,则大体上还原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关学传承脉络。冯从吾所彰明的关学演进序列,被清代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加以承续,他们累次对《关学编》加以补缀修订。从表面上看,这些关学史文献所著录的关中理学家,受到或“左朱右陆”或“是朱非王”或“是王非朱”的学术背景或学术大势的影响,其门户之见“亦所不免”,其体系亦或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元明时的关中大儒以承传濂洛关闽之学为己任,关学是在融入理学的大潮流中得以弘扬的。也就是说,此时张载关学的传承演进,是在与当时无法回避的濂、洛、闽、金溪之学以及后起的阳明心学的互动交融中得以传承和流衍的。

具体地说,金元时期的关学虽然处于低谷,但在元代因许衡曾在关中“衍朱子之绪,一时奉天、高陵诸儒与相唱和,皆朱子学也”(柏景伟:《重刻关学编序》),于是关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向,就是从先前的传承张载之关学,而转向笼统地传扬濂、洛、关、闽之理学,关学在保持自身特质的同时,也汇入到全国性的学术潮流之中。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明代关学一改金元的冷清局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兴之势。这一时期关学与异地学派的交流更为活跃,其思想交融也趋于深入,思想上的多元互

补推动了明代关学“中兴”局面的形成。在明代中期,由王恕、王承裕父子与马理、杨爵、韩邦奇等共同形成的旨在阐扬程朱而又修正程朱的三原学派引领风骚。几乎同时有薛瑄河东之学,经由段坚、周蕙而传薛敬之、吕柟,其学遂振于渭南和高陵,关学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涛。此时,阳明学崛起东南,渭南南大吉“传其学以归,是为关中有王学之始”。晚明关中涌现出被称为“关西夫子”的冯从吾,他能“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遂成为明代“集关学之大成者”(柏景伟:《重刻关学编前序》),至此关学心学化的趋向愈加明显。冯从吾之后,关学再次陷入“寥寥绝响”(王心敬:《关学续编》)境地。在清初,起自孤寒的周至李颀(二曲),以坚苦卓绝之身,肩程、朱、陆、王之统,遂“特振宗风”,其与“丰川超卓特立,说近陆王”(柏景伟:《重刻关学编前序》),其思想以“悔过自新”“明体适用”而为宗旨,使关学的心学化倾向尤为加强。从关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明代后关学一直是在与异地学者的交流互动中前行的。他们在交流互动中,既影响着对方,也完善着自身,这是客观的事实。

与李二曲大约同时的王建常,在清初关学心学化笼罩的氛围中独树一帜,重开恪守程朱一路,故李元春谓:“二百年来,秦士大夫知有程、朱、薛(瑄)、胡(居仁)之学,皆建常笃守之功。”(李元春:《书关学续编王复斋先生传后》引吴大澂《奏请从祀疏》)故贺瑞麟等认为其学问之于二曲“纯粹过之”。此后李元春、贺瑞麟沿着“确守程朱”的路向,径直走到清末。其间虽有柏景伟、刘古愚受时代的影响,一面坚守传统理学,一面又适时地接受新学;而时处清末民初的牛兆濂,则在理学趋于全面崩溃的背景下,仍坚持儒家道统的信念,恪守程朱理学的立场,并义无反顾地捍卫着儒家的学说,遂成为在中国近代发生的激烈的社会转型期依然固守儒学传统的最后一位有影响的关学大儒。

在关学传衍的各个时期,虽然也出现不同的学术流派或学派支脉,但是,张载“为天地立心”的志向,“立命”“继绝学”“开太平”的学术使命和社会理想,辟佛老异端、弘孔孟正学的学术宗旨,力行“先王之道”、躬行礼教、笃实践履、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一直被后世关中诸儒所阐扬光大。诚如明李维楨所说:“迨其后也,鹅湖、慈湖辈出,而周、程、张、朱之学日为所晦蚀,然关西诸君子尚守眉县宗指。”(李维楨:《关学编序》)所谓“眉县宗指”,即指张载的关学宗旨。如吕大临,他虽然在张载身后从程氏学,然其“守横渠说甚固,每横

渠无说处皆相从，有说了更不肯回”（程颐语，参见冯从吾《关学编》卷一）。吕大忠受张载学风的影响，“笃实而有光辉”（张骥：《关学宗传》卷二）。吕大钧始终秉持关学“躬行礼教”“学贵于用”的学风，“率乡人”作乡约乡规并付诸实践，促关中风俗为之一变。苏昞“学于横渠最久”，深得张载器重。张载逝世前，将自己一生言论精要集成《正蒙》一书，交付苏昞。苏昞仿效《论语》《孟子》体例编订为十七篇。范育应苏昞请求，为《正蒙》作序，指出《正蒙》之作，是为了“排邪说，归至理，使万世不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金元后关中儒者没有专宗横渠，但承传张载学脉者却不绝如缕。如声称学宗河东的吕柟，虽其学“归准于程朱”，然他仍“执礼如横渠”（《关学编》卷四），他还专门编撰《张子抄释》，以张扬其学。故冯从吾道：“集诸儒之大成而直接横渠之传，则宗伯（指吕柟）尤为独步者也。”（李维楨：《关学编序》）被黄宗羲列入三原学派的韩邦奇，曾著有《正蒙拾遗》，其思想虽然侧重于发挥易理，然其“论道体则独步张横渠”（白璧语，参见冯从吾《关学编》卷四）。而颇有心学倾向的冯从吾，亦对张载推尊有加，他在弘扬张载躬行实践、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方面，堪称楷模。南大吉虽然最早把阳明心学传入关中，但他回关中的学术志向则是“前访周公迹，后窃横渠芳”（《关学编》卷四）。故明儒毕懋康在《冯少墟先生集序》中说：“关中数十季来道脉大畅，文简（吕柟）得舆，先生（冯从吾）超乘，俾横渠之绪，迄今布濩流衍，而不韞斲，炳炳麟麟，岂不懿哉！”可见，关学是一个有本源根基、学脉传承、学术宗旨、风格独特而又包容开放的学术流派。张载开创的关学学脉没有中断，学风也一直在被承传弘扬。这一点是明代以来包括冯从吾、黄宗羲、全祖望以迄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学人的共识。如冯从吾所说，“横渠遗风，将绝复续”（《关学编》）。综上所述，如清人王心敬所说，由张载创立的关学之“源流初终，条贯秩然耳。”（王心敬：《关学续编序》）可以说，关学是由张载创立并一直在关中地区得以传衍和发展，并在其传衍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张载学脉相承、相继、相续之关中理学。

对于关学思想史的研究，侯外庐先生早年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已经开始，只是先生把关学史仅限定在张载及其弟子的学说。八十年代中期，陈俊民出版了《张载哲学及关学学派》的专著，对关学史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认为关学有史，首次把关学史从宋代扩展到明清时期，并指出“‘关学’作为宋明理学思潮中一个独立学派，它的终结也同整个理学一样，是始于明

清之际的理学自我批判的思潮中,是由李颀开其端的”<sup>①</sup>。笔者同意其关于关学史的发展同整个宋明理学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具有同步性的判断,不过,在清代,既有“理学的自我批判”,也有对传统理学的执著固守,如王常、李元春、贺瑞麟、牛兆濂等,贺瑞麟甚至认为“程、朱是孔、孟嫡派,合于程、朱,即合于孔、孟;不合于程、朱,即不合于孔、孟”(《记清麓问学本末》,见《蓝川文钞》)。在理学的大厦已趋于崩塌之时,他们仍坚守濂洛关闽之学直到清末民初。可以说,关学思想史事实上已经延伸到清末民初。对长达八百多年的关学思想史进行考察研究,是有其历史和文献根据的,也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要把八百余年来的关学思想史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展现出来,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虽然我想尽最大努力把这部书写好,但限于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其不足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朋友恳切地指出来。由于时间紧迫,自认留下诸多遗憾,只有待以后完善了。

刘学智

2014年12月8日

---

<sup>①</sup> 陈俊民:《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